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一段荒诞往事：“批判爱因斯坦”	郝柏林
【劫后反思】	真话有力量，忏悔为希望——《真话与忏悔》序言	唐少杰
【研究综述】	北京大学文革研究的意义与现状——《燕园沉思录》代序	从学廷
【往事非烟】	梦回沙洋（上）	杨立民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亲历者言】

一段荒诞往事：“批判爱因斯坦”

· 郝柏林 ·

1967年底，湖南醴陵第二中学的物理教师周友华写信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判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受到陈伯达支持。周恩来总理派驻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主持过一些讨论会，周友华曾被郑重地请到前排就座。

周友华在醴陵二中图书馆的墙壁高处挂了一个重锤，长时间地记录重锤尖点的位置，他发现重锤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呈现出季节和昼夜等变化，变化的相对幅度约为十万分之几，周从而得出结论说万有引力常数随温度变化，提出了一套“热轻冷重”学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同周友华进行辩论，指出所观测的可能是墙壁的热胀冷缩效应，周则提出墙壁很“结实”，重锤悬点绝不会移动等缺少基本实验证明的论据。辩论不过了就说：“你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沈觉涟回答：“我和你一样挣56块”。周说“你相对于我就是反动权威”。然而那时还可以进行辩论。沈觉涟、赖武彦和我三人还写了两篇文章，批判周有华的谬论，刘西尧吩咐把这些文章都铅印成单行本，供大家讨论。

不过这种情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呼声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走向高潮。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中央党校的造反派，以及外地来京人员构成的大批判组，纷纷作调查，写文章。中国科学院也成立了学术大批判组，由驻院解放军代表直接领导。不久，他们写了一篇大块文章。要送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已经印成了专供“中央首长”阅批的大字清样。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在1969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07期第3、4版上刊登了题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必须批判》的长文，署名是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文章中有一段话说：“现已查明：相对论的两个‘原理’，和它的独特推论‘同时性的相对性’，在迄今一切有关实验中都没有得到任何证明；但是，又都可以在另一些条件下得到验证而决定取舍！”这里“现

已查明”四字，是从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出刘少奇党籍“决定”中抄来的，那里说“现已查明，刘少奇是一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另外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是，爱因斯坦“不打自招”，承认自己是马赫的门徒。原来爱因斯坦在纪念马赫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受到马赫思想的影响。由于列宁曾经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过马赫的哲学思想，只要和马赫挂上钩，就可以“大获全胜、班师回朝”，不必再作分析。其实，同一个列宁还说过，马赫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

刘西尧在中关村福利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我和几位年轻同事的态度是：内部讨论由他们说去，我们管不了；文章不能公开发表，给中国丢人现眼。不过，进入会议室后，发现已经轮不到我们发言。原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竺可桢等不少前辈学者也坐在那里。

周培源的发言使那些批爱因斯坦的积极分子们大失所望。国内物理学家中直接随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只有周培源和束星北二人（关于束星北是否同爱因斯坦工作过，科学史界已经提出质疑）。由于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担任过上校物理教官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束星北远在山东。批判家们希望周培源能“揭发”一些第一手材料。周培源的发言却可以概括为“回忆爱因斯坦”。

周培源首先回忆了在普林斯顿工作时期的爱因斯坦如何衣着朴素、如何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在战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周说，有人批评爱因斯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不知道历史。法西斯德国驱逐和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爱因斯坦的态度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周培源最后说，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周恩来总理发了唁电。《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来到家里，忙了一夜，协助写出了一篇悼念爱因斯坦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是周总理的电报，第四版刊登了周培源的文章。

钱学森发言时首先说，昨天晚上读了革命小将的稿子，感到非常兴奋，我们年轻时就写不出来这样的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敢于向爱因斯坦这样的学术权威挑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接着说，爱因斯坦这个人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仅限于科学界。如果我们能根据毛泽东思想对爱因斯坦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就会在国际科学统一战线中增加许多朋友，否则就会失去一些朋友。因此我们要极为慎重、做好调查研究、不要急于发表文章。

这次会议上有位学物理的年轻人发言说，根据相对论，珍宝岛事件中谁先开枪，只要换一个参考系就可能颠倒过来。他忘记了罗伦兹变换保持因果性不变这一基本原理。不过，这类由青年科学工作者指出的“问题”，确实给当时进驻高等学校和研究所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留下深刻印象，增加了他们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对学术观点的决心。所幸的是那位青年人后来科学上进步很大，15年后成为正教授，对相对论和引力理论都有过贡献。

那篇文章终于没有在“两报一刊”发表。

不久，大批判组的成员们到上海去“汇报”他们的观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他们同工人座谈。座谈会上这些人自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上海的工人理论家们指出：“你们这是搞纯学术批判”、“对于爱因斯坦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首先要从政治上批倒批臭”。这些受到了深刻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兴奋地回到北京，在物理研究所召开座谈会，

汇报上海之行的体会，比较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感受。物理所的一些研究人员从会议室走进走出，个别人提了一两个问题，没有人对他们表示支持。被“结合”在所革命委员会里的革命干部郭佩珊说：你们看，我们的人都很忙，以后你们写了文章送给我们学习学习就成了。

大批判组接着到原子能研究所（后来从中分出高能物理研究所）去汇报。作完报告、一个问题也没有。主持人表示感谢，宣布散会。于是，大批判组得出结论，对批判爱因斯坦“越是外行越支持、越是内行越不支持”。外行们着手组织更大规模的批判行动。

原来陈伯达对于批判相对论作过“指示”：应当开万人大会批判相对论、把中学生、小学生都请来。不久，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们筹备就绪，写报告给空军党委，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当时航空学院归空军“军管”）。空军党委把报告送到陈伯达处请示，陈却在报告上批示说：先不要开万人大会；要作千百次实验证实或推翻一个论点；用五十年可以，用一百年也可以。

陈伯达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的原因何在？原来这时陈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着陈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修正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你陈伯达的本性也不会改变”。1970年8月党中央庐山会议上陈伯达配合林彪要设“国家主席”，要称毛为“天才”。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接着就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当时只是“指陈射林”，并未点出林彪的名字。直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之后，才正式提出“批林整风”。陈伯达在最后的日子里，以“科学技术”作救命稻草，跑到天津去抓激光技术的推广，甚至连1970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20年的大会也不想参加，还是党中央命令他回京开会。这些都是后来学“批陈整风”的正式传达材料中提到的事情。

这时，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开始降温。1971年初，驻中国科学院首席军代表石焯宣布，今后各个学科的大批判，由各个研究所负责，院里不再统一领导。不久，所革命委员会郭佩珊找我谈话说：院里把“相对论大批判组”下放给物理所领导，所里要派个干部去，特来征求我的意见。郭还说，你们不是对于科学政策有不少意见吗？伯达同志亲自过问相对论批判，他的秘书经常同大批判组有联系，你们的意见可以通过他反映到伯达同志那里去。

我当时已经知道陈伯达关于开万人大会的两次批示，觉得到这样被“亲自过问”的地方去很不好工作，就以小天线计算任务太重（这也是实情）为理由，谢绝了所革委会为我分配的这份工作。（按：我原来是物理所七室副主任，1967年1月革命群众“夺权”后没有再担任职务，经过1969年“九大”前后的整党，没有发现问题，按政策应当重新分配工作，这也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落实政策”范围之内的事。）

不过，我同这个“相对论大批判组”还是有缘分的，这个组里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几位年轻人，后来学习了不少现代微分几何和场论知识。一位从中央党校来的批判组成员、我国一位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的儿子，从内部揭发他们“在批判爱因斯坦的旗帜下拜倒在爱因斯坦脚下”，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物理所还派了工作组，“帮助”他们批判错误倾向，不过没有批动，1976年“四人帮”倒台，那位揭发者悄然离去。1979年原“大批判组”中的理论物理工作者，成为新成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这些全是后话。

对爱因斯坦的这场批判，剩下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本人的作用。我知道两件与此有关的事情，两者都直接涉及到刘西尧。

1971年“913”事件的保密时间较长。到了9月底，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还不知道林彪出了事。取消10月1日的国庆节阅兵和群众游行，大家私下里只是猜测毛主席的健康不佳，没有往林身上想。9月30日这一天，周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好像很清闲，他在物理研究所一整天，上午看了几个实验室，下午在“小红楼”召开了党员业务干部座谈会，听取“批陈整风”汇报。当时我和陈春先等正在起草一篇批判陈伯达的大会发言稿。我们提出应当把陈支持批判相对论写进去。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不是陈伯达自己的事，这里面有毛主席的意思，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写。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钱学森在国防科委内部贴了刘西尧一张大字报。大意是：你说过批判相对论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你又不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的指示，你就是捏造毛主席指示，否则你就是扣压毛主席的指示。

我估计刘西尧从陈伯达那里听说过毛主席关于批判相对论的话，但并没有机会直接见到毛。陈在位时，刘按照陈传达的意思办事。由于不能排除陈伯达“假传圣旨”的可能性，陈倒台后，刘只能缄口不提毛。

〔说明：这是在1990年代后期撰写的一篇回忆，2009年初次发表于《负载吟啸录——一个前沿战士对中国科学的感怀》一书中，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八方文化工作室。〕

□ 来源：《科学春秋》微信号

~~~~~

#### 【劫后反思】

真话有力量，忏悔为希望  
——《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序言

• 唐少杰 •

孙怒涛先生嘱托我为他新近主编的《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论集”）作序，我欣然应诺。这既是我们的友谊和使命所致，也是孙怒涛先生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所致，还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致。这一讨论集是继孙怒涛先生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以下简称“反思集”）之后又一回忆和反思清华文革历史等问题的力作。2015年春季，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和发行的这一反思集，洋洋洒洒上下两大册，七十余篇文章及文献资料逾百万字，不仅大大推动和拓展了清华大学文革史的研究，甚至填补了这一研究的诸多空白，而且在文革故乡内外的文革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特别是丰富和深化了类似于清华大学文革史的文革典型个案研究。就我所接触到的清华内外乃至中国内外的诸多文革史研究者或学者，评价起这一反思集，对于孙怒涛先生的工作和成就，尽管众说纷纭，但全都有口皆碑。

在此，借用陆小宝先生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孙怒涛先生本人的谢忱：“文革过去40年，许多人借反思文革为名，编造历史，美化自己，推脱自身责任。这时候，孙怒涛站出来‘拷问良知’，无情解剖自己；同时，他主动团结两派群众，弥合派性伤痕，并且召集大家写回忆文章，负起征稿和出版的重任，让大家认真总结文革教训。有这样一个孙怒涛为代表，我们清华大学文革中的一代，才的确的确不愧清华大学学生这个称号。”〔1〕进而，我还要强调的是，正是“有这样一个孙怒涛为代表”，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写作队伍，还有比较强大的顾问队伍（多达十几人）和更多的支持者，他们或帮助审稿校对，或在微信群里评

论跟帖，并为文集的组稿、撰稿和出版提供帮助，形成了团队的集体力量，致使清华的文革反思以及清华文革史的研究才会有今天这样既可喜可贺更可叹可望的成就，才会有在最近许多年里居于超越文革故乡所有经历过文革的其他单位、机构和部门的文革反思或文革研究而独树一帜的局面。

尽管孙怒涛先生主编的这一讨论集不如他主编的那一反思集那样作者多、文章众、选题广和分量大，但是，这一讨论集不只是直接来自2016年4月清华校庆之际一些经历过清华文革、年已古稀甚至年届耄耋的清华校友反思文革活动的特定结果，也是文革爆发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际那些进出过文革炼狱的一代大学生追忆文革体验的凝聚显现。原定2016年4月22日举行的“文革反思与清华”讨论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禁止，这也成为了文革爆发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际发生在清华大学这一文革最具典型意义的单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这一年，据我所知，除了复旦大学有关机构等极少数单位有一、两个学术工作坊之类的文革讨论会，在高校之外，反思、研究文革问题的学术论坛，近乎空白；在中国大陆，批判、审视文革历史的活动园地，无从谈起。例如，这一年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回顾和反思文革的新著，几近为零。迄今为止，在文革故乡，文革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与对文革的深入而全面的研讨，仿佛呈现出某种历史之反比的关系。因而，这也就更加显得清华校友们力图举办而最终流产的这一讨论会的可贵。这一讨论会的成果只能以文集的形式昭著于世，这与其说令人感慨，不如说有些悲壮！所以，这一讨论集的“前生后世”本身就是如今清华大学文革史反思之历练的写照，本身就是当前中国文革史研究之命运的反映！在近一、两年里，也正是以孙怒涛先生等为代表的从文革炼狱中走出来的若干清华大学生，既为文革历史的总体研究，（2）也为文革典型的个案探讨，（3）还为文革与文革前、文革后之内在联系的纵横揭示，（4）作出了令人瞩目而又相当出色的努力，取得了真正无愧于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岁月的成绩。

在我看来，这一讨论集主要有三个“亮点”：一是通过孙怒涛与樊思清的通信和对话，樊思清本人对其在清华文革武斗所作所为的忏悔；二是由提交上面所说的2016年4月清华校友文革研讨会文章以及相关的讨论文帖，还有为这一讨论集专写的文稿所折射出来的诸多真知灼见；三是从整个这一讨论集的总体到所有构成的文章、转帖和文稿所映现出的诸多取向和共同追求。

#### （一）

这一讨论集最大的“亮点”在于发表了樊思清的忏悔和反思文章，以及孙怒涛对于这种忏悔的前后过程写出的回顾、访谈录和由他本人整理出的众人评论的综述。在读这些文章、回顾、访谈录和综述之际，我是多次看了放下，放下了再看，掩卷长叹，伏案而思。那种无法诉说的情感沉重，那种无法言状的内心疼痛，阵阵袭来，久久难以平静。无疑，樊思清的忏悔在清华大学文革史的记忆和反思上具有某种开端性的意义。

孙怒涛整理的《坚定而艰难的一步——我与樊思清的短信、邮件、微信往来》，生动而又细致地再现了他与樊思清历经两年多（2014年3月至2016年4月）的信件来往，特别是他对樊思清循循善诱的启发以及对樊思清决定用文字公开进行忏悔的鼓励。我既为孙怒涛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壮举而称道，也为樊思清那泣血泣泪、如歌如诉的忏悔而“点赞”。

樊思清的《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一文，主要追述了1968年7月4日凌晨，在清华大礼堂西侧闻亭下的团派哨所（“闻亭”为纪念闻一多先生而命名，对于在此建立起清华文革武斗的据点来说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他向科学馆西门的四一四派战壕开枪，

打死了朱玉生的经过。这一事件是清华大学文革“百日大武斗”中严重的流血牺牲事件之一。樊思清因此罪行先是被关押审查、劳动改造数年，后被判刑，至1981年5月刑满释放。

樊思清的《我要反思——锁定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一文，重在结合作者本人沉重而痛苦的经历，深切反思了由文革的思想理论及其实践对于他本人乃至他那一代青年学生造成的几乎无法挽救、几乎难以化解的悲惨教训。作者把自己的反思主题单刀直入似地确定为：

“阶级斗争诱发人性之恶，是万恶之源”。作者明确无误地指出：文革的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所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以“阶级斗争”为“充分兼必要条件”，这种条件由以下“四个要素”组成：一是“用枪杆子维护的阶级斗争封闭场地”，二是“按需定制的政治运动名称”，三是“始作俑者按需定制或称群众自发参与的各阶级斗争主体”，四是“所有阶级斗争参与者的个人的‘千古不变的普通人性’”，这种普通人性按照清华校友阎淮的概括就是“趋利避害，善恶并存，千古不变”。由此，作者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和阐述了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各自基于这种普通人性而大加畸形地利用这种普通人性。上述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在文革之中的实际运作及其相关表现，不断地证明了文革领袖致使这种普通人性不断政治化、群众化、运动化和虚饰化之际，就是文革群众使得这种普通人性持续碎片化、派别化、异常化和残酷化之时。作者尖锐地指出，这“四个要素”具有其运作和其表现之主体和范围的重要不同或差异，因为，这“四个要素”中的前三个要素掌控在文革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一人手中，而最后一个要素即普通人性的要素就由文革群众个人来加以广为不同地对应、作用、发挥和显现了。所以，文革的一大“悖论”就在于“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从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这好似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作者把自己的真诚忏悔和痛彻反思相结合，不仅仅剖析自己所犯罪过的自我主观原因，坦承“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犯罪的外部环境和诱因”，而且还明确地把文革群众派别之间的“征战”以及文革不同群众组织头头的角色和职能归因于人性之恶的特定进发和特定泛滥，这就使作者把自己的忏悔和反思不断上升到更大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审视的高度：“既然我们认识到发动阶级斗争的‘要素四普通人性’掌握在我们个人自己手里，而且可以由我们自己选定，我自己就再也不会毫无认知，而是会经过反思，把惨痛教训传说给他人，引以为戒。”面对文革，历史太需要文革不同身份的参与者们进行反思或忏悔，而这种反思或忏悔即使在文革结束了四十年之后，依然还处在凤毛麟角的地步，而樊思清的这篇反思文章实属真正反思文革，切实自我忏悔的“范文”之一。

樊思清用他自己半生的坎坷、曲折、艰辛的经历所写下的上述忏悔和反思文章，的确如同陆小宝先生所说的：这是令我们“心灵颤动的文章”。在我迄今为止所看到过的一些文革当事人忏悔的文章中，很少有像樊思清这样的反思相对比较全面、细致和深刻，很少有像樊思清这样的检讨力透纸背地认真、入微和直切。

如果说樊思清的悲剧是清华大学文革时期一代清华人的一个不幸，那么樊思清的忏悔和反思也是经历过文革的清华人在几经大灾大难之后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勇气和超常自新的一个体现。可以断定，樊思清的忏悔和反思文章会在清华内外带来异常不同的反应和相当长久的回响。正如在孙怒涛整理的《校友热议樊思清忏悔》报道综述中所记载的那样，众多清华校友对于樊思清忏悔和反思的议论和评说已经不只是局限于樊思清本人当年的所作所为了。就此而言，樊思清的忏悔和反思已经不仅仅属于樊思清一人了。这种忏悔和反思尽管总是由当事者个人自我悔恨、怨愤、懊恼、痛苦而被折磨得无以复加所作出的大彻大悟，但是它们已经成为那个文革特定时代的特定回音，那种武斗个体生活的个体绝响！例如，对于这种忏悔和反思，署名“同行者”的樊思清也加入到上述的热议之中，他写道：“如果我们之中有一个‘林肯’、‘丘吉尔’、‘曼德拉’——发出声音：‘我们不打了！’‘大家解散回家！’有可能吗？”据我的猜测，樊思清的意思是他本人的悲剧不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也

是文革那一代从事清华武斗者的。换言之，这种悲剧发生和出现的必然性只能在于文革群众运动的暴力性和专制性。

事后，人们既有一千个理由来痛斥樊思清开枪的“罪恶”，也有一万个说法来谴责樊思清当年的“行凶”，但是，在经过了四十八年，也即近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又有多少像樊思清这样的文革经历者亦即负罪者公开地站出来，面对天地良心，以他自己的生活和岁月为代价的如椽之笔，大书特书他对死者、对母校、对历史和最后对自己的忏悔？在我看来，仅此一点，樊思清的忏悔和反思文章就在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的领域居于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

## （二）

这一讨论集所汇集的提交上述那场夭折了的清华校友文革讨论会的诸多专文，不仅包含了反思关于清华内外的文革历史许多问题的深刻观点，而且映现出批判文革的总体及其诸多方面的独到见地。

阎淮先生所著的《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此文不可辩驳地深刻阐明了毛泽东与文革的必然联系，亦即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的历史“规律”。我完全同意作者的上述观点，所以，我要强调：“文革系于毛一身！”在文革研究领域，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仿佛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研究下去的永恒话题。

杜钧福先生在《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于文革史研究的五个重要问题阐述了富有启示、颇有深度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些见解对于文革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在这其中，他的一个观点对于我来说大有启发，即在论及文革的研究现状以及已有的不足时，他写道：“朱学勤先生把文革比作法国大革命，我却认为，比作欧洲的宗教改革更为恰当。”这种把文革看成一场类似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观点颇为生动形象而又富有意蕴内涵。我曾把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角色主要概括为五种：第一是“上帝一神”，第二是“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第三是“现实的世俗领袖”，第四是从“马克思加秦始皇”到“斯大林加朱元璋”的转换，第五是“超凡魅力领袖”（亦称“卡里斯玛式”

〔Charisma〕领袖）。〔5〕我以前没有注意或没有涉及1966年开始的文革与1517年开始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历史比较。根据杜钧福先生提出的上述观点，我认为，毛泽东在文革的上述前三种角色就与文革更加密切地对应或切实地联系起来了。毛泽东在文革的“上帝一神”的角色不是指宗教或神学意义上的“上帝一神”，而是指毛泽东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和国家的唯一准则、人民和社会的绝对权威，成为文革运作的仅有的也是最高的标准。以毛泽东的意志为中心，这一点是使文革得以发动和进行的必要保证。毛泽东在文革的“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表明他不满于中共党和国家现有的干部队伍和权力体制，他大有可能发动和领导一场比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冲击社会“中坚”及精英阶层的运动，他要与亿万民众（类似信徒）直接呼应，来一场“天地翻覆”的直接互动。毛泽东在文革的“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使得他根本不可能他曾期望“打碎”或“砸烂”他所领导的党—国家，而是出尔反尔，修修补补，前后掣肘，内外冲突。无论文革的全过程还是其某一阶段，无不充斥着这一毛泽东否定另一毛泽东、此时文革消解彼时文革的“主题”或“特色”。无疑，正如毛泽东比起马丁·路德的角色更加复杂，后者只不过是一位教会人士或神父式的改革家，前者是集“上帝一神”、“改革家”、“世俗领袖”于一体的矛盾大家，这三种角色之间的张力大有可能使毛泽东从“上帝一神”的神坛上跌落，失去昔日“改革家”的神圣光环或色彩，而只不过是在“党权—政权—军权”三权之间孰大孰重的怪圈里循环了周遭的世俗弄权者。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三种文革角色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甚至固有冲突，自始就注定了文革归于不断失败或全盘异化的宿命。

文革类似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唤起了群众，带来了造反，而最后却压制或愚弄了群众，窒息或结束了造反。二者大为不同的是，前者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直指中共党一国家的干部队伍和权力体制，“由上到下”；而后者在一定范围是矛头指向罗马教廷的权威及其教义和教规，“由下到上”。正如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没有超出世俗的生活矛盾而被民众的实际行动特别是被农民起义的举动所终止，文革没有逃脱基层的文革群众组织而被广泛的文革群众运动搞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千疮百孔，元气殆尽，加速衰败，直至消亡。显然，文革比起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来更加复杂、更加曲折，也更加沉重、更加异化。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二者的可比性还在于后者开启了“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前者事实上促动了中国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临近。

沈昆先生的《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充分因素概述》，从八个方面入手，详实地揭示了文革得以酝酿、得以实现的领袖与民众、“官”与“民”之矛盾关系的必要因素；从历史“经线”和现实“纬度”的交叉和重叠切入，比较全面地展现出了文革得以发动、得以进行的党内外、国内外之互动作用的必要因素。一方面，这篇文章独特地把意识形态因素列为文革“必要充分因素”之首，这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有点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具体指出何谓文革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文革的意识形态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论”，二是“继续革命论”，三是“全面专政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文革意识形态及其全盘实践的思想主旨和理论框架。今天从某种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三论”分别应为：“阶级斗争论”旨在一种“政治整合论”，“继续革命论”重在一种“生活折腾论”，“全面专政论”归于一种“社会迫害论”。另一方面，此文非常深刻而又犀利地指出：“文革的失败不在于以军事政变的形式结束了文革，而在于文革无力建立新型的官民关系，在于文革试图通过整治人们的思想意识来约束权力、解决官民矛盾。”是的，可以断定，文革所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的“瓦砾”和精神的“废墟”远远多于、大于和重于这二者各自的“初衷”和各自的“践履”。

除了上述主题比较宏大的文章，这部文集还包括了别开生面的论题相对具体的文章，诸如关于文革前的清华反右运动与清华文革之关系、清华文革前的“政治教育”、清华文革之前的学生班级“政治生态”、清华文革之际和文革之后的干部势力及其代表等等问题的追忆和反思的文章，从而就很有可能使得这一讨论集“大放异彩”。

王铁藩先生的《说反右讲文革》，此文通过作者在1957年的坎坷经历和对清华文革的直接观察，把反右与文革相对比，有力地指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和必然递进：“反右是常态，文革是特型而已”。作者痛切地强调：清华文革令人“感触颇深的是知识分子不断被矮化”，而清华文革群众两大派组织的对立和冲突实质上使得“文革发生的重要条件应该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文革之恶不在政治路线孰是孰非，而是以糟践人作为贯彻政治路线的手段！”“文革集以往政治运动之大成，实现了对人的糟践的系列化”，其表现有三：“一是霸占人脑”，“二是糟蹋人格”，“三是草菅人命”。作者设想以巴黎公社的主要原则来铲除文革之恶以及官僚制度之弊端，这引起了校友们的热议。我个人认为，陈中平先生对此设想的评论，乃为高见。

周志宏先生的《从我的心路历程反思清华党化教育》，此文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多重曲折，细致入微地追忆和具体实在地评价了文革之前清华大学对于大学生实施的所谓“党化教育”。这种“大学期间的思想教育，十分凌厉和深刻”，从形式到内容，不可不说详尽细化、持续连贯；从讲课师资到教学阵势，不可不说庞大强劲、巍然显赫。然而，这种教育的根本缺陷或致命弱点，正如作者一针见血指出的：“不讲人性亲情”，直至很有可能使某些受教育者仇视自己的生身父母和成长家庭，更不用说很有可能歧视或仇恨其他被想当然地当



作“异己”或“另类”的亲人、师长、同学或同事等等。这种“不讲人性亲情”的教育在其受教育者的日后生活和发展中是否健康有效，或者何以谈得上至真、至善、至美以及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呢？我个人认为，清华文革时期出现的众多苦难和灾祸，特别是“百日大武斗”的种种厮杀和血腥惨案，对此则给予了如磐如山的“脚注”！

蒋南峰先生的《“四人帮”猖狂时期我在清华的一段特殊经历——写在文革50周年之际》，比较生动地追溯了文革时期很有代表性的、清华出身的普通干部的厄运和他们的心境，颇为独特地记述了文革之后清华个别校级领导干部对于清华文革具体问题、具体人物持有不同态度和处置所具有的角色冲突和形象反差，富有启发地引导人们去思索和审视自文革之前就已成势而在文革之后再次崛起、显赫的清华干部势力及其代表的言行轨迹和矛盾走向。从此文中，我就多少明白了多年前某位颇为知名的清华校级领导人物生前所写成的回忆录为何被其家人“扣发”而没有出版的某些缘由了。

范雨臣先生的《激情年代的激情故事》，以其个人的特殊经历，细致地揭示了文革之际清华同学的派别对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文革之前班级同学之间日常的政治“监视”机制或“告密”体制的运作，真切地再现了以一个清华班级为基点的文革前、文革中的大学生“政治生态”。我要强调的是，从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不难理解当年的文革诸多运动以及文革之前的诸多政治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层单位的日常生活道德专制运动或熟人之间的整治运动，更有可能还是基层单位同事（比如，大学生同学们）之间的迫害运动或者熟人进行的专政运动。当年在武斗“前线”，作者对一女同学进行“四派”与“团派”分裂、冲突之实质的剖析，真可谓画龙点睛。另外，正是在作者与这位女同学遭遇危险之际，他挺身而出，“英雄救美”，谱写的又何止是“黑色浪漫”般的“战地浪漫曲”？这段“战地浪漫曲”衍生出两年后作者与这位女同学的婚礼，作者颇为幽默地追数婚礼收到的礼物：“49枚主席像章、44幅主席像、22本语录、5套毛选，咳！”对这种境况，我并不陌生。当年作为小学生，我就目睹过文革时期青年人的婚礼上，新郎新娘互赠“红宝书”，彼此引吭高唱“红歌”的情景。

这一讨论集还具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色”，就是有几篇论及或涉及到文革研究方法问题的著述。毋庸置疑，建构和拓展文革研究的方法论非常迫切、紧要，因为现今有待于建立的“文革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人们如何从思维方法或认识方法上去通彻地审视和全面地把握文革及其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提及如下的两篇。

一是秦晖教授所著的《改革时期的四种文革叙事与历史真相》一文，相当完整地梳理和比较了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不同叙事方式的内涵和取向，有力地分析和阐释了这些叙事各自特定的显现和遮蔽，特别是凸显了造反派问题在文革叙事中的尴尬、困境或不足。“‘文革’中最残忍的一页到底是什么？现在可以肯定地讲，造反派整走资派是有很多不人道的、残忍的甚至是罪恶的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文革中最残酷的一页不是什么造反派斗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对文革前‘贱民’群体、包括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基于此文，不难得出，文革叙事中诸如一般参与者的某些问题，具体地说，诸如文革先是普通造反者或施害者、后是平凡边缘者或受害者的角色转换或命运改写，应该成为文革叙事或叙说文革的一个视域。

另一是陆小宝先生所著的《辨识文革时最常见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一文，此文是整个这一讨论集中最有方法论启迪甚至开拓性启示的文章。作者主要着力于如何从逻辑上（这里的“逻辑”主要是指思维的反思和批判；“逻辑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思维学”）合理地评价和正确地阐释文革及其方方面面。正如作者所言：“反思文革，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应该反思我们的思想方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换言之

之，亦如作者所指出的，人们是否跳出了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否还用文革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文革，这关系到人们能否真正实现反思和批判文革及其方方面面的大问题。此文从文革盛行的“非黑即白”逻辑的谬误理由、这种逻辑在政治运动中的极端体现、这种逻辑对一分为二哲学原理的曲解、摈弃这种逻辑及其偏激思维这四个方面入手，进行了筚路蓝缕的透视和鞭辟入里的分析，确实有助于给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们告别或拒绝文革思维方式带来积极的推动。

此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主要在于：一方面，作者借用美国流行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实际上就是对思维进行思维。”）理论及其方法来考察文革思维方式，从形式逻辑上证明了文革思维方式本身就经不起质疑，更经不起批判。文革思维方式在文革现实的运作体现不是“一刀切”，就是逐级逐层全力加码的“绝对论”。作者引用曾长期被称为“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官场上，……要将一事情搞砸和罪恶化，没有一种方法比以其夸张的手法极端执行更好了。”这一点似乎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也屡屡不绝。又如，对于在文革结束之际出于政治的需要，“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和做法流行开来，作者有力地辨析了这种“彻底否定”依然出自文革思维方式，“极端思维造成的危害，用极端思维的方法是纠正不了的。”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既不能阻挠更不能取代学术、学理上的探寻和研究，否则，反思和批判文革不啻多此一举，甚至还大有可能以政治上的粗暴来横加干涉或竭力制止文革历史的探究。文革结束后，文革遗留的某些弊端不仅没有绝迹，甚至还恶性萌发，死灰复燃，幽灵再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作者直切地指出文革思维方式与一分为二哲学原理密切相关。对于这个原理，“如果学歪了，就会直接导致非黑即白逻辑错误”；“如果学对了，却能成为克制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的有力武器”。我个人认为，今天应该对于这种一分为二原理有一个比较全面而通观、历史而具体的理解。显而易见，在文革期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人们不可能“学对”也不可能“用对”这个原理。新中国自1960年代初期开始强调和不断推行的一分为二原理，完全来自毛泽东为那时所高度强化的“阶级斗争论”寻求某种哲学方法论的依据。这种在文革大行其道和在文革后时隐时现的所谓“辩证法”原理，只注重矛盾对立统一关系中的斗争性以及斗争的绝对性。那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斗争哲学”名言不就是文革思维方式的一种绝唱吗？质言之，冲脱文革之前和文革之际那种广为说教、大力普及的一分为二原理的思想羁绊，也是文革研究方法论面临的一项重任。在我看来，作者的一些具体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逾越了一分为二原理，而且还印证了庞朴先生对于“一分为三”的发现和研究的。（6）

此文是作者主要立于逻辑论（主要是形式逻辑），并涉及到了科学领域的描述性问题与人文领域的规定性（norm，我认为用“规范性”更好一些）的差异来探讨有关文革的认识问题和评价问题，这就有可能启发人们把作者所重视的上述逻辑论问题进而与作者没有直接论及的价值论（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是人文意义上的）等等糅合或联结起来，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开阔文革研究方法论的视域和论题。作者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促使我们有可能在文革研究方法论领域中，把人文与科学、价值与事实、价值认识与事实认识、逻辑与历史（三个层面的“历史”及其统一：实在史—历史学—历史观）、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证明与证伪（7）等等辩证方法引入进来，并使它们相互有机地交叉、重叠、渗透和转化，继而促进文革研究方法论的不断丰满和健全。谈及文革研究方法论的不断丰满和健全这一点，不禁使我想起了北京地区两所相毗邻的中国大学所凝聚、所映现的大学精神，亦即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和用王国维先生话语的形容来说，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大学人文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的“重镇”是所谓“可爱的”，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科学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的“大本营”是所谓“可信的”。然而，这两所大学在文革时期所具有的精神又是什么呢？尽管这一时期不是由这两所大学各自所能左右的，但是在这一时期这两所大学的精神绝不是什么“可爱的”、“可信的”，更谈不上二者的融

合。由此而言，文革研究方法论的确立和发展至少应是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价值论与逻辑论的贯通。文革结束后不久，从北京大学学生喊出的时代口号“振兴中华”到清华大学学生发出的生活倡议“从我做起”之间的特定关联，就充分地印证了上述统一、结合和贯通的重要和必要。

最后，对于金岳霖先生题写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对联上联（“一切切切不可一刀切”），陆小宝先生续写了一个旨趣相应的下联（“两面面面还分两个面”），我本人试着续貂，写出横批，以便有可能构成如下相对完整的对联，力求推动我们在文革研究方法论的建树上不断地真正有所作为：

上联：一切切切不可一刀切

下联：两面面面还分两个面

横批：切面何为

### （三）

这一讨论集的另一大特色在于把清华一些老校友（我之所以称他们为老校友，是因为他们的年纪大都在“耳顺”或“古稀”之上）在有关校友们的微信群里对相关文章的讨论帖子，汇集起来，加以发表。这是孙怒涛先生主编的那一反思集里所没有的。这种把校友们非常直接、具体、真实并且往往是在第一时间写下的帖子汇集、发表，既提供了一个处在不同时空的诸多校友共同参加讨论清华文革问题的“广阔”平台，又展现出一个集中体现清华校友们的见识和素养、取向和追求的“直观”视窗。我常常感受到，品读这类帖子，有着阅读与这类帖子相“伴随”的专文所没有的意境或意味。当然，这类帖子与其相关的专文不是相得益彰或交相映辉，就是相互砥砺或相互交锋。更有意义的是这些帖子的作者之间的交流、商榷、争论或共鸣，不但往往超出了原来专文作者的立意和寓意，而且时常给我这样的读者带来了阅读专文所没有的疑惑、思索、诘问和追寻，当然，更有解惑、感悟、启迪和教益。由这些帖子所集聚体现出来的特色和风格促使这一讨论集锦上添花而绝不限于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多棱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出了清华校友们反思、研讨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具体问题的争鸣氛围、大度气派和包容风范。

显而易见，这一讨论集凝聚了一代已经走近或者已经走入人生晚年的清华校友们为了明天更美好而反思过去，把握今天的心声，闪烁着这些每人都几乎经历了传奇般人生的校友们祝福母校，祝福祖国和祝福人类的心愿。人间重晚晴，哲思力千钧！例如，年已八旬的林贤光老师在孙怒涛先生主编的那一反思集上册中，写出了称得上填补了清华文革史研究一大空白，揭示了清华文革初期一些普通教师心路历程的长篇专文《我和清华“红教联”》。

（8）这次，林老师写出了《“启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一文。林老师孜孜以求，苦苦探寻，不断追问民主、自由、启蒙的真谛，他的铿锵话语给我们敲响了一座无形而又宏亮的启蒙“警世钟”：“文革中，破坏了一切，也破坏了我们的良知。所以要把我们自己的良知找回来，然后对自己进行痛苦地‘拷问’，包括反思、检查和忏悔。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大环境或别人身上去。这就是一个自我的‘再启蒙’。这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在我看来，这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新一代清华人乃至新一代中国人来说，同样重要！也正如沈昆先生在杜钧福先生的专文之后所写的短帖：“中国的第二次启蒙始于文革。”

陈中平先生的《夏虫语冰录——世纪回眸话文革》，具体地把1966年的文革“奉旨造反”与1957年的反右“引蛇出洞”加以对比，深刻地论述文革之前、文革之际与文革之后共有的“启蒙与增昧”之间的比较、转化，发出了饱含作者毕生之体验、之顿悟的呐喊：“八十年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蒋南翔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

静的书桌！时光荏苒，在我们躬奉盛世憧憬梦想之际，我殷切期望：今日之中国，能够容得下一个充分表达各种意见的理性论坛。”

因而，如同孙毓星先生在评议樊思清的忏悔所写下的短帖而映照出那敢为人先之表率的铮铮话语：“试想，如果清华的我们一代都学不会民主，那中国还有希望吗？”同样，还是孙毓星先生本人在《关于清华文革反思的感想和思考》一文中，难能可贵地又一次以身作则，对于他本人在文革的过失而在不同场合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悔过，并且以这种撕心裂肺般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悔过为底蕴，铸就成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清华人的自觉、自为：“只有反思自己才能反思文革，只有走出自己才能走出文革”！

#### （四）

正是在我接到孙怒涛先生的邀请为这一讨论集作序的前夕，由于再“清楚不过”而又再“不清楚不过”的原因，我在清华大学所开设多年的“文革史论”一课被停止讲授。由此之故，我更加感受到这一讨论集的珍贵和独特。

按照清华大学现今的规定和要求，本科生在校学习四年期间，必须选修四门全校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清华全校共计有二百多门的此类“通识性”课程，每一学期可以开出数十门此类课程）。我已讲过十余年、约二十个学期的“文革史论”课程（最初的课程名称为“文化大革命史论”，后改为“1966—1976年中国文化史论”），平均每一学期选修人数“限定”在二百人左右。超出我预料的是，我的这门课程受到众多学生的欢迎和好评，这有清华大学教务部门每一学期统计的学生评估数据为证。令我深感忧虑的是，我要在这个课堂上给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学生，每每必须从关于文革事实的起码常识和关于文革历史的普通知识讲起，这些都只是刚刚过去了数十年的文革常识和历史知识。课后，经常有学生告知我，他们事前不知道母校清华著名的“二校门”曾经被他们如今爷爷、奶奶般年纪的校友所摧毁；不知道“红卫兵”还彼此分裂过，“造反派”还相互厮杀过；不知道文革时期“进”大学是几乎不讲学历的，“上”大学几乎是不用考试的；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与苏联当年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家面临一触即发的大战，催化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宿敌的和解、和好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文革时期在国内奉行极“左”政策与文革中、后期外交上奉行实“右”政策并行不悖、游刃有余；不知道为什么文革当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或巨大的国际影响，而却最终没有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或根据地；不知道为什么文革初期、中期和后期，各自的“病理”或“症状”反差如此之大、裂变如此之深；不知道为什么文革的终点就是改革开放的起点……。面对这一系列的、难以计数的“不知道”，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丝毫不责怪我的学生们对最为切近的那段好像销声匿迹了的中国历史感到陌生或茫然，我只能感叹我们数代人对于文革历史的回顾、评述、反思和批判是多么地苍白、无奈、难堪和悲哀！

更超出我预料的是，不仅仅有几家外国新闻机构驻京分社的记者要为停课之事采访我。对于这种采访，我会说些什么呢？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一概婉言谢绝。而且在我的上述课程被通知停开后的几天，许多曾经选修过我此课的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纷纷给我写邮件，打电话，发帖子等等。他们或询问事由，或商约面谈，或给予慰问。一时间，我在清华校园的路上、食堂和图书馆等地，遇到上过我此课的一些同学大都上前同我或打招呼，或问情况，或表同情，或发感慨……。凭借网络时代交往技术和交流信息的迅速、简捷，有那么几天，我收到了众多发来的或转来的短信、评论或微信短帖，有关心，有信任，有鼓励，有安慰，有意外，有惊诧……。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对我的此课进行指责、否定、批判或诋毁。其中，几篇颇有代表性的评论和短信在网络媒介中被迅速转发数万次。我的一位同事知道此事后，感慨地揶揄我是“一夜网红”；另一位同事说我的此课被停开是清华大学教学史

上的“一个事件”。我的亲人安慰我说，学生们的评价才是衡量老师讲课优或劣的尺度。是的，面对甚至置身于上述学生们给我此课的种种评价，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痛苦或不尽的惆怅，而是有了更大的希望和更多的慰藉。下面一位曾经选修过我此课的同学写信给我所留下的沁人肺腑、刻骨铭心的话语就是明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样的事情，遮盖布是挡不住的。无论怎么样的黑暗动荡和血腥，我们，我们这些学生，都应该正视阴暗，追逐光明，坚定理智而独立地走在最前面啊。”“这都是文革史（论）这门课让我回头去学习和体会到的。而此时此刻，有如饮冰，只希望作为青年，我们纵使十年饮冰依旧难凉热血。而青年热血不凉是需要教育去引导的，也祝愿老师，热血不凉，传灯无数。”正是有了这些令我热泪长流的勉励，我在清华大学为研究文革历史，为开设文革史论课程所经受的压力、所遇到的艰辛，值了！无独有偶，还是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讲得好，他在2017年9月清华大学庆贺教师节，欢迎新教师的会议上说：天下第一等职业还是教书！

我在上述的“文革史论”课程中都会专门讲一堂“清华大学文革历史”。其中，围绕着清华大学文革时期惨烈的“百日大武斗”，我都要向选修我此课的学生们直面发问：若是再次发生文革或出现文革这样的事情，在座的同学们是否还会向或同校、或同龄、或同级、或同班的同学下得去毒手，诸如对自己的同学告密、诬陷、迫害、虐待直至拳打脚踢、刀劈剑刺、开枪射杀、扔手榴弹吗？当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数一数二的大学学府里竟然发生过、出现过由大学生们进行的如此众多这般惨烈而现如今匪夷所思的举措，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庆幸的是，经历过清华当年文革武斗“战火洗礼”的胡鹏池、但粦先生给了我、也给了广大的清华学人一段掷地有声的回答：“在欺骗面前，我们或许会迷惘；在暴力面前，我们或许会软弱；在潮流之中，我们或许身不由己；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绝不做超出人性底线的事。回顾、反思清华文革的意义最终落脚于此。”〔9〕不仅如此，基于杨继绳先生为前述的这一讨论会所写的《为什么民间文革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专门发言稿，我要“接着讲”，即引申出如下的问题：能否彻底地反思和把握文革史，这确实关系到理解或审视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转型和变革，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重构和改革，数十年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建设和创造是否真正全面、是否真正成功！

总之，无论是回顾、反思清华文革，还是研究、批判整个文革，我们的立足点之一就在于曾经“沐浴”过清华文革狂风骤雨的阎淮先生对于上述那段回答所给予的余音不绝的回应：

无论暴君独裁，尽管极权专制；我们  
可以神马都没有，但必须有一——良知！  
可以神马都不要，但必须要——人性、人道、人权！  
可以神马都不是，我们必须是——摆脱了兽性的人！〔10〕

（作者简介：唐少杰，男，1959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注释：

- 1，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下册）》，第1173页，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2，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版、2017年第二版。
- 3，胡鹏池、但粦：《清华七二七事件——1968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香港，田园书屋，2017年。

4，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香港，明镜出版社，2017年。

5，参见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办的“写毛泽东时代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之一，2013年10月25日），发表于吴迪主编的《记忆》电子文刊2014年12月31日第14期（总第105期）。

6，参见庞朴：《一分为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在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看来，宗教、意识形态等无法证伪；科学，只要是科学，就是可以证伪的。参见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04页，杜汝辑、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8，林贤光：《我和清华“红教联”——文化大革命前两年我的经历（1966年初到1968年7月27日）》，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上册，第231页—347页，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9，胡鹏池、但燊：《清华七二七事件——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第487页，香港，田园书屋，2017年。针对有人说：问题是人性的底线是很难定的，上述两位作者的答复同样是简洁质朴而又振聋发聩：“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人性的底线？有哪一个人说他没有？有哪一个人敢说他不是人，他是没有人性底线的？”同上，第478页。

10，同上，第482—483页。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研究综述】

北京大学文革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燕园沉思录》代序

• 从学廷 •

北京大学是文革的发源地与重灾区。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写的第一张大字报，从此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文革初期，北京乃至全国的师生、群众，纷纷到北大取经，北大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文革中，北大被说成是“池深王八多”的反动堡垒，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在工作组、校文革、宣传队的不同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打击，非正常死亡近70人，数百名干部、教师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关入劳改大院强迫劳动，一批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动学生，近万名学生停止学习2—4年，耽误了学业，最后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分配到农场、农村、边疆、矿山等艰苦的环境从事非专业的劳动。1968年3月29日，北大爆发了长达4个月的武斗，3名无辜学生死亡，数百人受伤，大量教学和生活设备遭受破坏，给北大造成重大的损失。1968年8月19日工人宣传队进校后，虽然停止了武斗，但又连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给广大师生造成了新的打击，并对全国造成恶劣的影响。1969年—1971年，1000多名干部教师和家属被驱赶到血吸虫病灾区江西鲤鱼洲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北大文革研究是北大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文革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探明北大文革历史中重要事件、活动的真相，对北大文革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并非要追究某些当事人的责任，也不是要判断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的是非对错，而是为了总结历史

的经验教训，避免类似文革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同时，把北大文革当作一个样本进行解剖，对于全国文革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

近些年来，北大文革历史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原党委书记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其中1966—1976年文革时期的记述，比较详细。2008年该书又进行了修订，可作为北大文革研究的基础资料。其次，北京大学图书馆对收藏的文革时期的报刊杂志、大字报选、动态报、传单等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类编目，该工作已经完成，印红标教授参与了这项工作。第三，部分校友，包括文革时期的干部、教师和学生，通过回忆录等方式，出版或自印了部分书籍和资料。

以下是收集到的部分有关书籍和资料的目录：

1.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8年第2版
2.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
3. 季羨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4.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5. 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
6. 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
7. 郑培蒂，云卷云舒，东方出版社，2007年
8. 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9.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11年
10. 陈平原主编：《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 丛璋、亚达、国真、林爻等编：《燕园风云录》（1—4），2012—2015年，自印本
12. 陈一谔：《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3年
13. 奚学瑶、张从、孙兰芝、丁广举主编：《告别未名湖》1—3，九州出版社，2013—2015年
14.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台湾），2014年
15. 王复兴：《抢救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以上书籍中，大部分是经历过文革的北大人的个人回忆，大多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其中文革中声名显赫的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她极力为自己洗白和辩解，出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记述，受到一些知情者的指误。季羨林先生和郝斌先生对牛棚的回忆真实地记录了被关押在劳改大院里的干部、教师受到的非人虐待的情况，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丛璋等人编辑的《燕园风云录》（1—4）收集了分散于报刊和网上的一些有关北大文革中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忆和评论，内容比较丰富。

此外，一些对北大文革历史有亲身经历和了解的老干部，例如李雪峰、吴德、张承先、彭珮云等，也在他们的回忆录或专门撰文中，记述了有关北大文革的内容。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很多人利用网络工具发表、收集有关北大文革研究的文章和资料。例如国真创办的《闽海网·华声四海》中刊登了大量有关北大文革的文章，胡宗

式在博客中和网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北大文革历史的文章，也有一些校外的人员如许大城、杜钧福等在网络上发表了有关北大文革的评论文章

但是，总体来说，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主要表现在：

- 1) 研究力量薄弱，人员分散；
- 2) 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
- 3) 原两派组织（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和重要当事人、知情人没写出自己的回忆录；
- 4) 北大文革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内幕还没有搞清楚。

当前研究工作的主要困难是：

- 1) 缺乏文革史料，文革时期的档案、资料查阅困难；
- 2) 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陆平、孙蓬一、牛辉林、宋一秀、赵正义等已经去世；尚在的也已年老体衰，不能动笔；
- 3) 原两派组织的成员观点差距大，不能坐在一起共同研究。

本书的编辑者都是北大老五届学生，退休后接触文革历史研究工作，从大量的资料中搜集、整理并选编了部分文章，汇编成书，旨在为文革研究者和读者提供参考，为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本书分为以下几个板块：

- 一) 往事追忆：是一些北大文革亲历者对往事的真实回忆，其中有些作者已经去世（如颜品忠、陈一谔等），他们的遗作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 二) 祭奠冤魂：是对文革中惨死的北大师生的回忆与纪念；
- 三) 怀念师友：是对已经去世的周培源校长和其他老师、同学的怀念；
- 四) 访问记：记述了对几位文革当事人的访问情况；
- 五) 鲤鱼洲与六五三：是对江西鲤鱼洲农场和陕西汉中分校生活的真实记录；
- 六) 探究与反思：对北大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探究，对北大文革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反思。

201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120周年纪念，谨以此书作为对母校校庆的一份微薄的献礼，并希望以此推动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本书的不足之处尚多，诚恳地请广大校友和读者批评指正。

□ 原载《燕园沉思录——北大文革回忆与反思》，2018年

~~~~~

## 【往事非烟】

### 梦回沙洋（上）

• 杨立民 •

有一天我大儿子告诉我，和他同届毕业的一位同学，现在当了官，在湖北荆门挂职锻炼，知道我们北外（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注）有像我这样一批老教师当年在沙洋五七干校呆过两年半。而沙洋恰好是荆门的下属机构，所以他叫我儿子通过我问问我们校领导有没有兴趣见见沙洋市政府的负责同志。据他说，沙洋现在已经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他们领导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专门负责和当年在这个地区办五七干校的很多中央机关和大学‘联络感情’。他表示当地领导一定会欢迎我们旧地重游，并做出安排，尽地主之谊。



一提沙洋这个名字不禁慢慢勾起了我四十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记得好像是1970年的春天——我记不大清了，反正当时学校里抓了一阵“五·一六分子”，又搞了一阵“清理阶级队伍”，文革搞了四、五年，乱成一团，深入不下去了，人也累了，谁也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突然，上面传达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要大家立即离开北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办五七干校，一面劳动养活自己，一面继续完成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北外的地点是湖北沙洋。学校军工宣队领导决定除少数老弱病残和负责照看职工年幼孩子的人暂时留守外，其他自原党委书记罗士高以下，所有教职工和学生，包括我们英语系水天同，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张汉熙等老教授，统统必须下去。而且，说得很明白，这次是再也不回来了，要在沙洋走一辈子。

北外的师生员工经历了文革几年的疾风暴雨，这时多少已真有点像一支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军队，马上就开始准备起来。回头想想，当时不要说沙洋，就是叫我们立刻开拔到越南前线，估计大家也不会有二话。人改造到这个地步，上面来的命令已不需要解释动员。再说，学校已不成学校，无可留恋。家里本来也只有一些破烂，所有“财产”基本上一个箱子就都装下了。剩下的就是一些书，但既然下去一辈子要当“普通劳动者”，书就都用不着，我决定除了“红宝书”和一两本马列原著的英译本，其它一本都不带。衣服么，平时上山下乡的行头，都是现成的。我反正除了几件替换的内衣，其他衣裤都准备穿到成为碎片为止。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也有坛坛罐罐都舍不得丢的，个别的甚至连煤球炉子也带上了。但总之，这千里大转移，整备工作顺利得难以相信，队伍不久就整装待发了。

我们英语系的教师分成三个小队，我因为是壮劳力，当了一个小队长。出发那天，全校大概1000多人，除少数老弱有病的可以乘车以外，每人都得背上自己的行李，长途行军十六里地，到郊区一个小火车站乘慢车，大约二十几个小时到达武汉，再从武汉乘船上溯汉水到沙洋码头，最后从沙洋码头再扛上全部行李，步行18里路到七里湖——我们的目的地。一路上，大家情绪出奇的好，互相不停地拉唱，还有文艺队来回打快板。这也许是因为，整整四年多了，天天大字报，批斗会，不是整人，就是被整，反复烧烤，神经一直绷得很紧，现在大家一起到遥远的农村来了，四面都是开阔地，连空气都洋溢着久违的自由味道，让人情不自禁都感到是个解脱。起码五七战士这个名称听起来比臭老九要好听多了。

我必须说，走五七道路一开始，我的表现自认为还是可圈可点的。一路上，我没有少帮老弱的同事。到目的地以后，我还一次又一次带着我的扁担，返身去接半道上的队里同伴，等到全队精疲力竭到达营地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

沙洋这地方，我们以前都没听说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当时算县还是镇。我们去时，十分荒凉。人很少，砖瓦结构的房屋建筑几乎见不到，名副其实，是一片沙的海洋。这里好像本来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据说收留着五十万左右因为偷鸡摸狗或其他政府认为说了不该说，做了不该做的原因送到这里的劳改犯。这劳改犯是我国的独创。用不着法庭判决，单位一个命令就把人押起来，送到一个地方强迫劳动。劳改条例（不叫法律）本来规定有时间限制，但估计因为文革的关系，有关领导无暇过问，有不少劳改犯也就一直在农场关着。现在为了给我们这些也要劳动改造的五七战士腾位置（除我们学校，中央还有不少部门的五七干校都设在沙洋），公安部长谢富治大概这才想起这些人，于是一声令下，把他们全赶走了。我们住的地方估计就是以前劳改犯留下的宿舍，一排排草棚，上面铺的油毡。棚里两边各有五十张睡铺，一边男，一边女，中间由齐身高的一排秫秸隔开。睡铺上铺着稻草，每个铺位大约50公分宽，一翻身几乎不可避免要惊动左邻右舍。分配铺位的客气地问我睡眠情况如何，我骄傲地回答，一倒就着。“那好，你就用这张铺位。”我发现原来我右面是张汉

熙老师，左边是美国回来的台湾同胞杜秉洲教授；一个打呼噜，可以引发学校教师集体宿舍楼的三级地震，另一位呼噜威力虽然不如张老师，但音调和节奏很有特色，外加说梦话，咬牙，怪叫，杀伤力也可观。此后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夜里夹在两位中间，听着他们的协奏曲，想想自己的狼狈处境，越想越滑稽，有时不禁暗笑起来。古语云：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我倒好，卧榻之旁，酣睡的还不止一个。

不过，当天晚上，实际上谁也无法入眠。因为天十分闷热（很怪，当时还是春天）。棚里没有窗，五十人实在透不过气来，那位美国回来的台湾同胞杜秉洲教授就开始用镰刀自己开窗。别人纷纷效法，结果，不到半小时，我们男的这边就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木头柱子，墙都拆光了，四面通风，草棚干脆成了一个凉亭。这下，大家才舒出一口长气，放下疲惫不堪的身体准备睡觉，没想到却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来，而且夹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在这个荒郊野外，一打雷就像身边落了颗炸弹，一下就驱散了所有人的睡意。大家都紧张地等着下一个闪电和炸雷。这雨和雷电却居然久久不停。从我们头上油毡的无数破洞哗哗漏下来的雨比外面的还大，大家只好急忙把所有脸盆，茶缸都用来接水。就这样，不停接水倒水，忙了一夜，片刻未曾合眼，迎来了沙洋的第一个早晨。

天亮了，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走出草棚，眼前稻田里到处是潺潺的流水，水面闪耀着金色阳光，水里不断跃出起码有两指宽的鲫鱼。好像都在表示对我们北京来客的欢迎。我来自浙江一个小山村，家乡的小桥流水人家，深深留在我记忆里，但自从我14岁离家出走，就难得有机会再见到这样像故乡的江南农村。沙洋七里湖相当荒凉，但仍然有它的美。记得队伍刚进入这地区时，一路上到处是一块块碧绿的草地，路边的树上停着各种漂亮的鸟，草丛里则不断窜出野兔，雉鸡，而且都不怕人。据说体育教师王季春有一天干活时突然内急，在林子里出恭，看见前面伸手可及的地方居然有只漂亮的野鸡歪着脑袋打量着他，他伸手去抓，但慢了一拍。野鸡飞了，只抓了根漂亮的羽毛。池塘里有鱼有虾有乌龟。稻田里则到处是蛙声一片，不像现在的北京，城内郊外连一只癞蛤蟆都很难遇到。不过，我必须遗憾地承认，沙洋的飞禽走兽，很快就看透了这帮北京来的人，这些人经过改造，已经有多少爱恋花鸟虫鱼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灵魂深处都对他们不坏好意，不久就个个变得很有革命警惕性了。

这一天开始，第一件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洗嗽卫生的问题。以前住我们这地方的劳改犯显然没有自来水，于是我们一千多男女教职员工和学生只好统统奔向一里地外的一个池塘。这池塘结构很特别，中心地带水并不深，四周却一下让人没顶。塘很大，据当地人说，记忆中就没有干枯过。水里那时倒也没有什么残留的化肥，农药之类，可就是池塘边的水面上颇有一些新鲜程度不同的牛粪飘着。我们用水时只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设法拨开它们了事。1000多老少爷们和大小姑娘围着大池塘一起洗嗽，对当地百姓来说，肯定是难得的奇观。洗嗽完毕以后，更大的问题是解手的问题。还好，这一点，以前的劳改犯倒给我们留下了现成的设施。我们系的上百个男女教师共用一个大粪池。和睡觉用的草棚一样，也是中间用秫秸隔开。粪池是大约丈半宽，三丈长的大坑，深不见底，使用时大家就沿边排开，背靠背蹲着作业。便池没有扶手，不小心掉下去，就不是简单的‘更衣’问题，后果很难设想。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不过我当时34岁，手脚还灵便。不知那几位60左右的老先生是怎么完成这种高难度动作的。干校根本不承认有个人隐私一说。生活上的种种尴尬，都不是上纲的大事，就不细说了。

用水问题，我们第二天发现似乎不难解决。这里几乎任何地方只要挖地一尺就见水，而且因为是沙地，经过沙子渗透过滤，水还特别干净。但后来我们又发现，一早挖的水坑，不到晚上就给沙重新盖满了。所以每天各个小班都不得不重挖一个。为了1000人的做饭喝

水，只好下决心挖深井。这可是个重体力活，因为沙边挖边塌，挖井的必须超过塌陷的速度。这种活少不得要点到我，张毓霖，刘润清，李季方等强劳力。

沙洋这里的沙土地，最适合种棉花和花生。水多的地方也习惯种一季麦子，一季稻子。我们刚到那里时，麦子还没有熟。地里有干不完的活。麦田要管理，棉花地要不停地施肥，除草。收完麦子要脱粒，晒干，抢场，入库。然后就要犁地，平地，育秧，插秧，种水稻。整个农场除了几辆旧卡车，不记得有什么现代化机械。工具就是锄头，铁犁，镰刀。动力仍然还靠十几头水牛。牛都上了年纪，而且营养不良，要马上精心照料，让他们上膘，准备春耕。到时需要大量肥料，还得马上开始天天积肥。此外，1000多人每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有大量的事情，要大家自己动手。要长远过日子，还得自己种菜，养猪养鸡（这任务就交给那些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教师负责。这些人不少本来就在‘牛棚’，现在改成猪圈，也算专业对口）。除此以外，还要自己烧砖，烧石灰，等北京运来木料，水泥，油毡，在六建宣传队师傅的指导下进行基建，造一批教室宿舍两用的砖瓦房。到那时，也许要“复课闹革命”，校名也许要改成“沙洋五七革命外语学院”。

这些活都不轻。我们不像当地老乡，每天一大壶水，一杆旱烟，不声不响，不慌不忙。我们是大部队作战，唱着歌，打着红旗，一到地里，风风火火，看起来一个个都像突击队员，劳动英雄，其实工作进展远不及那些老农。不过，我们经常还要通夜加班，挑灯夜战。不加班，海军宣传队也会时不时地半夜进行紧急拉练。让一帮已经精疲力竭的教师睡眠惺忪地像夜游神那样背上通常没有打紧的背包，在黑夜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部队里最年轻的战士急行军。这行军的队伍也怪，看着领头的步速也不算太快，但越到后面，人就拉得越远，都要一溜小跑，才勉强跟上。有一次，等队伍回到营地好大一阵以后，我才发现有个熟悉身影慢慢到来，靠着一颗树喘大气。过去一看，原来是师兄梅老夫子。我问他怎么啦，他向我挥手示意，叫我不要管他。这时，他已经无力说话了。他有先天性心脏病，白天干活，夜里再拉练，实在难为他。不过，当时，天天号召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类个人的困难，谁也顾不上。

实际上，回头看来，五七道路的目的之一不就是让这些知识分子吃吃苦头，出出洋相吗？为此，除了拉练，还有烈日下面的操练。记得每次，许老正步走总是左右的手和脚同时摆出，样子的确十分滑稽，每每引起周围观看的师生一阵阵哄笑。一个智商那么高的学者，怎么就学不会这么简单的动作？怪不得军宣队那么喜欢让我们操练。但是这些对付知识分子的办法，却难不倒我。除了不会拼刺刀，什么一，二，一，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打背包行军，我都不在话下。至于劳动，我本来就不大讲卫生，不怕脏，也不怕累。要起肥，我跳进粪堆，面不改色。派我去背米背盐，肩上二百斤的大包，仍能健步扛到卡车上。带队的8341部队的小林，却摇摇晃晃，显出狼狈相。我们从沙洋码头往七里湖搬运建筑材料的那一次，更为知识分子臭老九多少争了口气。我们有的一人扛一筒80斤重的油毡，有的背一袋100斤重的水泥，有的三三两两抬大小不一的木料，我则选择用扁担挑二十八块红砖，上下午各从码头往回挑一次。两次来回一共行程七十二华里，其中一半路程要肩负140斤重量。不仅如此，我还要几次回去接应半路上那些年老体弱，走几步就必须休息好大一阵的同事。像我这样的教师很不少。就我所知，女教师中有徐克容等好几个，挑的担子和我们男劳力也差不了多少。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年龄因素，真正了不得的是像王公，许老那些老教授们。他们虽然各自只背两块砖（共十斤），但起码也要和大家一起每天走七十二里地，其中一半路程，身上背的十斤重的东西，会越走越重。俗话说：千里无轻担。今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也不见得挺得下来。大多数老先生一大早出发，下午第二次去码头，等到回营房的时候，已近午夜，天上的月亮都高高挂起来了。说起那次从沙洋码头运料，还有一件趣事。记得第二天，我和三四个壮劳力合作，用一辆大板车拖几根特大的木料。由一个人驾辕，其他人不是在后面推，就是各自在车上找个地方拴根绳子在两边拉。没有想到，这车越

拉越沉。实在拉不动了，就只好一次一次停下来检查大车是否出了毛病。可是每次检查，车都好好的。一直要大家精疲力尽快到家的時候，有一个人（好像是陈祖芳）才无意中发现，是王德杏把拉车的绳子拴到车闸的操纵杆上了。

我感觉沙洋的劳动强度大，也许因为这里的地都很平坦，一马平川。一块地动不动就至少一千多亩。收麦子的时候，几十个人干半天，似乎也就只啃下巴掌大一小块地，前面仍然一眼望不到头。每天上工时站在地头，望着前面这无边的土地，心里都不禁气馁。我在沙洋几乎干过所有工作，我放过一段牛，每天五点半带牛吃草，等牛吃饱了才牵回来自己用早餐。我犁过地，能用我那条老牛懂得的语言指挥她前进，停步，后退，提右前腿或后左腿。有时太阳晒得受不了了，我那条牛会不等我批准径自带着犁跑到附近水渠泡凉水澡，我也就跟着和衣下水和牛同戏。过一阵牛回去了，我也赶紧浑身水淋淋的爬出来，跟着她继续干活。身上衣服等泥土干了，用力拍一阵，第二天照穿不误。我积过肥挑过粪，而且从来没像有严重内八字的钱青那样，会连人带粪桶一起跌进沟里。我也进山烧过石灰，一天下来，浑身白灰，头发上，嘴巴里，鼻孔中，到处都是，怎么洗也洗不掉。我在稻田里除过稗草，开始几天常常敌我不分，拔掉的全部都是稻秧，而稗草全部漏网。其实，说起来我好像参加了水稻种植的全过程。沙洋水稻田里干活，有一种北方人没有见过的蚂蟥，让他们（尤其是姑娘们）谈虎色变。这种小虫能叮在你腿上，吸你的血，让你满腿是血而不自知，而且很难拽掉。南方人还骗北方人，说要是不注意，让它钻到腿里面，就得动大手术。这当然骗不了我这个南方人，我知道看见腿上有蚂蟥，只要猛击几掌，它就会掉，让后把它里外反个个儿，它就害不了人了。我最怕的只有棉花地里的活。在棉花地除草时，棉花往往已经有一定高度，拔草时低头弯腰在棉花从中前进，热闷难当。加上我个子高，弯腰困难，几小时下来，只好单腿跪着前进，到最后只好一屁股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移动。那的确非常伤我自尊。到收棉花的时候，情况也远非像电影里面包着花头巾的采花姑娘们那么浪漫，富有诗意。棉桃都带刺，摘花只要一两个小时，没有经验的就会手指上都是鲜血，一个个都不得不贴上橡皮膏。

不过我后来慢慢想，其实一辈子这么在田野里干干活倒也不错。那些农活不难学会，比学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容易多了。什么重活，一咬牙，也不可怕。肩膀和手心的血泡破了又破，第二天继续干活，重担再一次压到血肉模糊的肩上时，的确疼得钻心。但很快也就麻木了，再坚持十天半月，慢慢就会长出老茧。到时，几乎刀枪不入。平时不必动脑筋，头脑也没有太多费心劳神的事情。干活的时候出身汗，休息时，凉风一吹，浑身张开的毛孔，让人难以描述的舒畅。然后溜到地边桑林里（我们把它们叫快活林）吃桑葚，吃到满嘴乌黑。这一切谈不上诗意，但颇有些野趣。还有，沙洋一片沙海，地上找不到一块石头，没有任何割破脚的东西。我在沙洋两年，一年到头，一身破衣服，几乎一直光脚，不但省下了不少布票和鞋钱，而且把我多年的脚气都治好了。这里虽然有沙地夏天的炎热，但沙洋有特别凉爽的季节风，整天在地里干活，绝少有人伤风感冒。至于有夜里失眠，食欲不佳之类的人，在这里这种毛病我想肯定都彻底断根了。我本来睡眠就不错，经过沙洋锻炼，更练就一身硬功夫，可以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甚至可以全身躺在一条普通长条凳上甜蜜地进入梦乡，这难度不亚于奥运会在平衡木上翻筋斗。毛主席好像说过，一个人一天能吃能睡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能吃能睡，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所以我虽然智力平庸，倚仗我这一身硬功夫，居然给我混到领导上最后要给我举行教学五十周年的庆功会。这都是后话，不提也罢。

我唯一在沙洋不幸堕落的事情是学会了抽烟。每天地里干活，都会有段休息的时间，老爷子们叫它‘抽袋’，意思是到了抽袋烟，提提神的时候了。每到这个时候，那些烟鬼们就嘲笑我，连烟也不会，不像爷们。于是在他们的教唆下，我开始试着抽他们主动扔给我的烟。不知不觉地就有了瘾。慢慢地再伸手要来白抽‘smoke whitely’已经不好意思了，就开始自己掏钱买。记得当年飞马牌算是好的，两毛多一包，大家经济困难，有时就抽‘大生

产’牌的，一毛三一包。也有的，甚至抽当地的野茶叶解馋。不到两个月的功夫，我的烟瘾已到两天一包的程度。为此，我良心受到深深的责备，因为我每月56元工资，要养活两个儿子，每月除了留下20元给自己，其余都得寄给家里。这留下的20元中还要积累出假期探亲的来回路费，哪里有余钱给我抽烟？于是，我就开始拼命戒烟，把这看成是自己对老婆孩子忠不忠的考验。但这一来，让我认识到自己实在缺乏男人应有的意志。后来，我只好请求我的好朋友王若，叫她代为保管我的生活费。叫她不管我怎么恳求，也不要把钱给我，免得我去买烟。王若笑着答应了。但不到两个星期，她实在不胜其烦，就把那几块钱扔还给我，从此以后，眼看我日益沉沦，她都不管了。

但总起来说，沙洋的五七道路对我们思想改造是有好处的。尾巴是翘不起来了。一个个都承认只能是一颗渺小的小螺丝钉。最主要的是，天天就是吃饭，劳动，睡觉。不读书，不看报。业务如何拔尖，地位如何出人头地，如何争取当讲师，副教授，教授……。都不想了。真的，除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其他什么名啊利啊都不想了。没有力气想。当然也知道，想了也没用。总之，头脑里不要说杂念邪念没有，其它念头也很少。思想变得纯洁得可爱。如能永远这样，我坚信国家也许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但永远不会变修。中国也不会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正我无法想象我们这些挑着粪桶的知识分子在沙洋这个地方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经历过这些艰苦生活的人，的确也不太怕吃苦，什么都能咬牙坚持。我们也不会再浪费粮食。我就永远不会在饭碗里留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看到现在年轻人浪费粮食的样子，总让我太息不已。担心这样下去，国将不国。

可是，说什么都不想，也许有一点夸张。我有时就想，所有大学生，教授，大小知识分子，如果都每天放放牛，起起粪，成为不合格的新农民，成为没有知识的‘无知识分子’，这个国家能现代化吗？能发展科学技术吗？能保证有远远超过美国的生产力吗？沙洋这样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吗？共产主义的理想天国就这样实现吗？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公民吗？我暗暗很有些怀疑。我还想，国家在我身上化的本钱不少，可我现在拼上老命也不一定能养活自己，从全国来说，这是不是一笔很大的亏本生意？我还想了很多别的。有位好朋友，私下开玩笑，说我像三国演义里的魏延，脑后有反骨。不过，医生只说我脑后螺旋是反的，别的倒没看出什么毛病。我就是克制不住要胡思乱想，为此一辈子没少吃苦头。现在科学发达了，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基因闹的。

我那时老暗暗想的最大问题是，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强调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我在农村生活了14年，家乡的农民各种各样，包括我同乡鲁迅小说里描写过的阿Q，小D，癞胡，闰土，祥林嫂。我都记忆犹新。他们中有不少好人，但并不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且，好人坏人似乎也很难以贫富划界。毛主席究竟要我们学农民什么？中国农民的确比较吃苦耐劳，勤俭朴素，但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够艰苦的，脑力劳动也并不轻松。总的来说，农民是比较可怜，但正如我老同乡鲁迅说的，可怜的人必定也有可憎的地方。农民中有不少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东西，但就总体而言，他们的确比较落后，愚昧，保守，自私。农村生活有时充满乡土气息，风俗传统。那里的山山水水，自然风光，又历来是文学，诗歌，音乐，艺术的源泉。那种脚踩黄土，头顶蓝天，与自然如此贴近的生活，也让今天深受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喧闹污浊的城市之苦的人的向往。但所有这些都不像是毛主席让知识分子下乡的真正目的。当然，中国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知识分子不了解，不关心农民是不对的。一个国家更不能不尊重农民的利益。但是要让全国百姓都农民化，理由是不能说服人的。我这几十年来，逐渐了解了一些背景，对当初走五七道路这件事有了些新的认识。我觉得，也许这和毛主席觉得年轻时受了那些大学者的轻视真有关系。毛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当年进不了北大，只好当图书馆管理员，还挨了申斥。在早期党内，他在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国焘等大知识分子面前，只能充当农民代表的角色，味道也大概不好受。后来到延安，像王明这样的大概也不相信山沟沟里出来的毛能懂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颇有一些像洪

秀全，黄巢那样的失意书生，冲天一怒，走上翻江倒海大闹天宫的道路的。难怪毛一生中始终不停地对知识分子用尽尖酸刻薄的词语，嘲笑他们虽然言必称希腊，实际上就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或‘山间竹笋，嘴尖皮薄腹中空’。在他眼里，知识分子还不如杀猪的，因为猪不像书，会跑会叫。他搞所谓的大跃进的时候，还专门组织一批文人收集材料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更进一步提出‘知识越多越愚蠢，越多越反动’。毛也曾经把知识分子比作孙悟空，承认没有这位齐天大圣，唐僧不能到西天取得真经。但这位大圣，毛说，就有一个缺点，就是骄傲，不服从领导，所以，观音菩萨不得不教给唐僧一个紧箍咒。毛之所以要全国知识分子都去下农村，走五七道路，恐怕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些大小孙猴子头上套上这金箍，让他们彻底臣服。毛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为此，他看了17遍资治通鉴，把几千年皇权统治的艺术琢磨透了，继承而且发挥到极致。

（未完待续）

□ 来源：北外王立礼的新浪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